

蔡东藩

前汉演义



中国历代通俗演义

前汉演义

蔡东藩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104 号

封面设计：章西厓

前 汉 演 义 (合订本) 蔡 东 藩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数 30,375 插页 16 字数 608,000

1981 年 8 月新 1 版 1992 年 3 月第 5 次印刷 印数 38,171—49,100 册

ISBN 7-80511-114-6/I·94 定价：13.40 元

蔡东藩与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

蔡东藩与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

我们的伟大祖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。她在历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割据的局面，但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传承来说，几千年间从未中断过，一直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，兼收并蓄各兄弟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，一脉相承到今天。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，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。

中国历史的记载和编纂，早在殷周时代便出现了。特别是秦汉以来史家辈出，各种各样体裁的史书，多得难以胜数。就拿系统地记载我国从古到明代历史的一部二十四史来说，卷帙浩繁，其中西汉司马迁写的一部《史记》，就有一百三十篇。此书纪事起自传说的黄帝，迄于汉武帝，首尾共三千年左右的史事，为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。东汉班固所撰《汉书》，也有一百篇，分一百二十卷，记载西汉一代的史事，是我国第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的纪传体断代史。此后，南朝刘宋范曄的《后汉书》、西晋陈寿的《三国志》，直到清朝张廷玉等修撰的《明史》等史书，均是承自班固《汉书》的纪传体断代史体裁。一部二十四史，除《史记》是通史体裁外，其它二十三史都是这种纪

传体断代史。这些断代史以帝王的纪传为纲，故《隋书·经籍志》称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等史书为“正史”。这些正史，体裁一致，代代相衔，自成体系，是世界各国历史著作中所罕见的历史巨著，是值得我们珍视的。

二十四史有三千二百五十九卷，再加赵尔巽等汇集清代一代史事，编写的一部《清史稿》五百三十六卷，总数多达三千七百九十五卷，一个史学工作者要尽读这么多的史书，确非穷年累月，毕生以赴不为功。广大人民是喜爱历史的。可是，这些史书都是出自封建士大夫和史官手笔的高文典册，不仅史事内容，头绪纷繁，史料芜杂，一般人望而生畏，不敢去读；就是读了也不易读懂、读通。因此，如何使这些高文典册的历史知识，能广为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？这个问题，早在唐宋时代就有一些平民文学家开始注意了。唐直一、丘南中未从同平十八，唐末平定史氏内补。天说书，原是民间艺术形式之一，为广大人民所喜爱。敦煌发现《陌君变文》、《伍子胥变文》等等大批唱说历史故事的写本演史变文。到了宋代，这种演史变文发展成为专以历史为题材的讲史。唐代已有说三国故事的，北宋时“说三分”已盛行。元代全相平话中的《三国志平话》是宋代说三分的文字记录本。此外，还有说《五代史平话》的。南宋时讲史艺人继前代门庭，又有新的发展，有讲“孙庞斗智”、“刘项争雄”的，有讲《汉书》与晋、宋、齐、梁诸《书》的，有讲《通鉴》汉唐历代书史文传、兴废争战之事的。有的还说张、韩、刘、岳，说铁骑儿，讲《中兴名将传》等宋代抗金时事的“新话”。元代讲史艺人，继宋入演史流风余韵，“尝以野史作为评话”演讲野史，现在流传的有《三国志平话》、《武王伐纣平话》、《七国春秋》（后来演变为《孙庞演义》与《走马春秋》）、《秦并六国》、《前汉书平话》（续集）等五种全相平话。到了明代，说书艺人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们，常将原来分散零乱的

说书题材整理统一成话本，又在这基础上加工润饰，发展成为通俗演义形式的章回小说。明代评话、词话兴旺，章回小说流行更盛。明清间，特别到晚清，历史小说和历史演义，日盛一日。

《三国志》是陈寿修撰的。后来，南朝刘宋时代的裴松之详为注释，成《三国志注》。明代人罗贯中更据此结合宋元以来《三国志平话》本以及流传民间的有关三国故事和传说，写成章回小说，成为宋元以来演义创作成熟的标志和第一个成功的范例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，流传很广。《三国志》以文高，而《三国演义》以通俗胜，因此，时人读《三国志》不如好读《三国演义》，社会影响极大。明末冯梦龙依据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等史传，将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撰辑的《列国志传》修订成一部《新列国志》，共一百零八回。清代乾隆前后，蔡元放为此书加评语和批语，加工删改成为《东周列国志》。这部书的文学艺术价值不高，影响所及远比不上《三国演义》，但比起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来，读者不知要广泛多少倍。明清以来的这些以历史题材创作的演义小说和历史演义，成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风格演义体裁，在历史知识的传播上，起着正史二十四史所不能起到的作用。

计，蒋公入人其，兴之聘斯夫”，世中《读史新考》中谓《列国志》“去史太远，不若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之近于史也”，上之史出于平八八，致之世

蔡东藩，名郎，字椿寿，浙江萧山临浦镇人，生于一八七七年（清光绪三年，丁丑），卒于一九四五年，年六十八岁。他二十岁前已中秀才，清末以优贡生朝考入选，调遣江西省以知县候补，到省不久，看不惯官场恶习，称病归里。辛亥革命前曾一度宦游福建，逾月即归，一直住在临浦镇家里。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，经好友山阴人邵希雍介绍，和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发生关系，修改邵著《高等小学论说文范》，他自己另撰《中等新论说文范》，并开始为会文堂书局撰写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。一九一六年写完《清

史通俗演义》后,接着写元史、明史、民国、宋史、唐史、五代史、南北史、两晋、前汉等通俗演义。到一九二六年九月才写完最后一部《后汉演义》。蔡东藩的这部书,从秦始皇写起,一直写到一九二〇年,共写了两千一百六十六年的历史。全书一千零四十回,五百多万字,均由会文堂书局陆续印行。到一九三五年,会文堂书局加上许愿父续的《民国通俗演义》四集四十回,全部改印,总书名曰《历代通俗演义》,分装四十四册。这样一部自秦写到民国,系统完整、独立完成的历史演义书,确是空前的巨著。此书印行后,深为广大读者所欢迎,销行数量很大,风行全国。一九二七年,蔡东藩病,旋任临浦小学语文教师。抗日战争开始后,临浦镇沦陷,他离开家乡,辗转避难,受尽颠沛流离之苦。一九四五年春,他终于病倒了,没有看到抗战胜利,怀着国仇家恨悲愤地与世长逝。

蔡东藩生活的清末民初,正是国事维艰、风雨飘摇的历史大变动时代,许多怀着“国亡有日”的预感的爱国知识分子,从不同的世界观出发,象毛主席在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一文所描写的,他们到处寻求着救国奇术,济世良方。一八九七年,严复、夏曾佑在《〈国闻报〉附印说部缘起》中说:“夫说部之兴,其入人之深,行世之远,几几乎出于经史之上,而天下之人心风俗,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。”梁启超在《译印政治小说序》中也说:“六经不能教,当以小说教之;正史不能入,当以小说入之。”大力提倡编写通俗演义小说和历史演义。一些人利用中国历史上救亡图存的事迹,用通俗演义小说笔法宣传教育,以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。“小说救国”、“演义救国”的呼声,在清末的各种期刊上,象雨后蛙鸣似的传播开来。早在—八九七年(清光绪二十三年)就创刊了一份《演义白话报》。报上曾刊载一篇《通商原委演义》,共二十四回,专写鴉

片战争历史，后来出单行本时，书名叫《罍粟花》。一九〇四年（光绪三十年）黄世仲写了《洪秀全演义》。一九一二年（民国元年）上海书局刊行自由生著的《新汉演义》，共四十回，专写自武昌起义到南京政府成立这段辛亥革命的历史。这年，广益书局也刊行雪巷写的《神州光复志演义》，共一百二十回，演写明亡至民国成立的清代历史。其中的《罍粟花》，孙楷第的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将它列入明清讲史部，是一部敷演鸦片战争全史较早的通俗历史演义。

当时，说部叙史的有记、花、传奇和演义四种。传奇为剧本，有出目、牌曲，其它主要在于说史。记、花属于纪事本末，只限于一事，演义则是说专史。蔡东藩的第一部历史演义《清史通俗演义》，就是在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间（民国四、五年间）在《神州光复志演义》等演义救国思潮影响下写成的。早在辛亥前一九〇六年（光绪三十二年），吴趼人曾发表《历史小说总序》和《两晋演义序》。他“发大誓愿编写历史小说”。可惜，不久他的计划就夭折了，而完成吴趼人一生梦寐以求的宏愿的，却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饱受书商剥削与冷遇的蔡东藩。

蔡东藩善诗、能医，诗作在亲友中不脛而走，著有医学与文字学专书。而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是他著作中最具规模、最有影响的一种。这是他作为一位埋头苦干的老教育家、医生、历史学家与演义作家对祖国所作的惊人的贡献。

三

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和冯梦龙、蔡元放的《东周列国志》原是两种泾渭分流的有代表性的演义作品。罗贯中出入经史，融合了很多宋元以来的话本、民间流传的故事和传说，是一部文学艺术价值较高的演义体历史小说。而冯梦龙认为文史殊途，力

图扭转历史演义朝向文艺小说发展的趋向。因此，他竭力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，要求做到“无一事无来历”，要把“临潼斗宝”、“鞭伏展雄”之类虚构的故事逐出演义之林。当时的胡应麟与清朝的章学诚、袁枚等继冯梦龙之后，指责罗氏。章学诚在《丙辰劄记》中说：“唯《三国演义》创七分事实，三分虚构，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。”还说：“其最不可训者，桃园结义，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。”蔡东藩承袭冯、章之后认为文史殊途，历史演义必须以正史为经。他在《唐史通俗演义》自序中说：

以正史为经，务求确凿，以轶闻为纬，不尚虚诬。徐懋功（勣）未作军师，李药师（靖）何来仙术。罗艺叛死，乌有子孙。叔宝（秦琼）扬名，未及子女。唐玄奘取经西竺，宁惹妖魔。……则天淫秽，不闻私产生男。玉环伏诛，怎得皈真圆耦。种种谬妄琐褻之谈，辞而辟之，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，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。子虚乌有诸先生，谅无从窃笑于旁也。

他在《宋史通俗演义》的序文中也说：

宋代小说，亦不一而足，大约荒唐者多，确凿者少。龙虎争雄，并无其事；狸猫换主，尤属子虚。狄青本面涅之徒，貌何足数。庞籍非怀奸之相，毁出不经。岳氏后人，不闻朝中选帅。金邦太子，曷尝胯下丧身。种种谬谈，不胜枚举。而后世则以讹传讹，将无作有，劝善不足，导欺有余。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，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，以诬古而欺今乎。

他写历史演义即或采用稗官轶闻时，认为必须要以有旁证者方可。他在《明史通俗演义》的自序中还说：“若夫燕词郢说，不列正史，其有可旁证者则概存之，其无可旁证而大涉荒唐者，则务从略，或下断语以明之。文不尚虚，语惟从俗，盖犹是元、清两演义之故例也。”他叙述整理明代史料的情况说：

考索《明史》凡三百三十二卷，《明通鉴纲目》凡二十卷，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凡八十卷，每部辑录，多则数千百万言，少则不下百万言，非穷数年之目力不能举此三书而遍阅之。况乎稗乘杂出，代有成书，就令有志稽古，亦往往因材力之未逮，不遑搜览，即搜览矣，凭一时之獭祭，能一一记忆乎？且官私史乘，互相勘照，有同而异者，有异而同者，有彼详而此略者，有此讳言而彼实叙者，是非真伪之别，尤赖阅史者之悉心鉴别，苟徒事览观，能一一明辨乎？

蔡东藩还担心读者虚实难辨，误虚为实，蒙受不正确的历史知识，因此，常在正文或批注中作出简明的批斥，做好交待。例如《宋史通俗演义》十六回写到陈搏之死时说：

陈搏系一隐君子，独行高蹈，不受尘埃，若目他为仙怪一流，实属未当。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搏老祖，捏造许多仙法，作为证据，其实荒唐无稽，请看官勿为所惑哩！

又如《后汉通俗演义》第八十二回写到刘备请到了诸葛亮，与关羽、张飞同至新野，由徐庶接入，故人聚首时，下注说：“徐庶走马荐诸葛，出自罗氏《演义》。按《蜀志》诸葛传中，庶尚留新野，未曾诣操，今从之。”第八十四回写到徐庶辞刘备归曹操时，也下注说：“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详载此事，庶归曹操，系在备当阳败后，且庶母亦不闻自杀，与罗氏《演义》不同。”

遇有正史记事和稗史轶闻所载史事有所出入时，他并不是一意迷信正史，还是能权衡事理，择善而从。例如：《宋史通俗演义》第三十七回写到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事时，他下注文说：“《宋史·寿昌本传》谓刘氏方娠即出，寿昌生数岁还家。但据王偁《东都事略》、苏轼《志林》皆云寿昌三岁出母，今从之。”遇到正史和野史的记事有所出入，难于决择时，他常取存疑

或折衷方法。例如《明史通俗演义》第二回郭子兴在濠州遭孙德崖和赵均用暗谋时，朱元璋往救之，注云：三凡《史部》卷十八《宋本史部》

此事悉本《太祖本纪》。惟本纪叙此事，在濠未被围之前，而谷著《纪事本末》，则言此事在被围之时，且事实间有异处，本编互参两书，以便折衷。

事实上，他在这部历史演义中也常酌用稗史轶闻和民间传说。例如：他在《南北史通俗演义》第九十三回中所写李庆儿梦魇其与隋炀帝往游第十院，见玉李盛开，院中起火，炀帝被焚事，正史所无，是从韩偓《海山记》中援引来的。他在后批中自我解嘲地说：“近如坊间之《隋唐演义》、《隋炀艳史》亦尝采入，但彼多附会，此从简明，终非穿凿者所得比也。”炀帝看了项昇所筑楼，曲折迷离，特赐名“迷楼”。此事正史所无，也是从韩偓《迷楼记》中援引来的。他在总批中自我辩解说：迷楼事“未见正史，而韩偓《迷楼记》当必有本。”还说：“本编所采，皆出自文献所遗，非徒录坊间小说者所得借口也。”他在《明史通俗演义》第四回关于孙德崖邀宴事以及孙德崖下落，不见正史，无文可征，据稗官补写“探虎穴约会孙德崖”，后批云：“至若孙德崖邀宴事，未见正史，而稗乘相传，及乡曲妇孺俱知有兴隆会一事，或者史官失载，亦未可知。且德崖与子兴并起，子兴生卒，及其子天叙之存亡，史笔俱详，而德崖不见下落，其有阙文也无疑。作者援引稗官，补入此事，有文征文，无文征献，宁得以虚诬目之。”

尽管如此，蔡东藩仍然陷入矛盾。作为一个史学家，甚至是一个具有考据癖的史学家，他有意无意的摆脱不了史料的束缚。在理论上他承认演义是文学，要以情动人，有别于史学。对于历代成功的演义与小说，特别是《三国演义》与《水浒传》等，在塑造人物形象与借景抒情等方面的经验与成就，给予他很大的帮助，为

他所重视。然而，他一面看到历史小说之长；一面又为史料所拘束，难于融合。他在《前汉通俗演义》第二十五回的后批中说：“夫正史尚直笔，小说尚曲笔，体裁原是不同的，而世人之厌阅正史，乐观小说，亦即于此处分之。……文以载事，即以道情，……是即历史小说之特长也。”可是在《后汉通俗演义》第一回又说：“罗贯中尝辑《三国演义》，风行海内，几乎家喻户晓，大有掩盖陈寿《三国志》的势力。若论他内容事迹，半涉于虚。一般社会能有几个读过正史？甚至正稗不分，误把罗氏《三国演义》当作《三国志》相看。”写历史演义时如何吸取历史小说之长，又能把史料处理得恰到好处，使二者融合贯通之，这是明清以来历史演义作家们多年的难题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作为史学家的蔡东藩不无有所偏爱之处。就历史知识传播说，蔡著称得上是一部演义体断代史通俗辅助读物；就文学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说，因受正史史料束缚过甚，远不及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》之大之广。

蔡东藩写《历代通俗演义》的注文时，除了上面说过的象《通鉴考异》那一套史料考核，对正文中所用某些古代的官制、法制、地理、器物、名号乃至俚语，考虑到一般读者难以理解，因此，也随文作了很多简要的通俗的注释。《前汉通俗演义》里就注了不少，例如：

第五十回，淳于意家居临淄时，“尝至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处学医。”注云：“公乘系汉官名，意在待乘公车，如征君同义。”

第七十回，汉武帝接济贰师将军李广利，“又发天下七科谪戍，使他运粮。”注云：“七科，谓吏有罪一，亡命二，赘婿三，贾人四，原有市籍五，父母有市籍六，祖父母有市籍七。”

第二十四回，韩信连胜楚军，“一次是在荥阳附近，二次是在南京地方。”注云：“南京系春秋时郑京，与近今之江宁不同。”

第八十二回，霍光死，宣帝“特赐御用衣食棺槨，出葬时候，用

輓輓车载灵柩”。注云：“輓輓车为天子丧车，车中有窗，闭则温，开则凉，故名輓輓车。”

第一回，“萧何原是刀笔吏，叔孙通又是绵蕞生。”注云：“绵蕞系表位标准，绵是置设绵索，蕞是植茅地上，为肄习典礼之处，使知尊卑次序。”

这类注释，通俗易懂，既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正文，也给读者增加不少确切的历史知识，是必要的。

蔡东藩在五四运动前后，受资产阶级民主与科学思潮的激励，对鬼神、风水迷信以及某些封建保守思想，采取一定的批判态度。例如：《南北史通俗演义》第九十一回写杨素与杨广谋杀杨坚后，杨素看到杨坚“显神”时，夹批云：“贼胆心虚。”后批云：“疑心生鬼，亦人情所常有。”“人生之不可亏心，心苟一亏，魂魄不摇而自悸，有不至死地不止者，此作者警世之苦心也。”《明史通俗演义》中这类例子很多，例如：

第十一回，朱元璋欲火攻陈友谅舟师。需仗风势。铁冠道人说：“真人出世，神鬼效灵。”周颠说：“今日黄昏便有东北风。”夹批云：“此系测算所知，莫视他能呼风唤雨。”

第十八回，刘基为胡惟庸毒药致死。夹批云：“刘基非无智术，惟如后人所传，称为能知未来，不无过誉，使基能预算，何致为惟庸谋毙。”

第二十一回，建文帝用方孝孺议，仿周礼更定官制，“条订礼制，颁行天下。”夹批云：“方氏虽一代正人，然未免迂腐，看他下手，便是急其所缓。”第二十五回，燕王军下盱眙，陷扬州，京师震恐，方孝孺入奏：“今日事急，且许割地议和，暂作缓兵之计，俟至募兵四集再决胜负。”夹批云：“此老又出迂谋。”

第二十一回，燕王对贵胄说：“今编户齐民，对着兄弟宗族，

尚相顾恤，乃身为天子亲属，性命偏危在旦夕，天下何事可为，亦何事不可为。”夹批曰：“越是帝王家，越不能顾恤宗族，燕王乃犹未知耶？”

当然，蔡东藩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知识分子，他的思想深处是十分复杂的。在很多的批注中浸透着传统的封建宗法正统思想。第二十回，太子早死，朱元璋欲立燕王棣为储君，学士刘三吾抗奏，“孙承嫡统，是今通礼”，“弟不可先兄，臣意谓不如立皇孙。”夹批云：“援经立议，不得以靖难兵变、咎及三吾。”第二十一回，“燕王棣次子有燧，曾封汝南王，竟密告棣不法事。”夹批云：“以子证父，不得为直。”

蔡东藩在夹注夹批和后批中褒贬人物时，亦常用小说曲笔。马氏曾多次向朱元璋进谏，《明史通俗演义》第三回评道：“好马氏，好贤妇，我愿范金事之。”褒得真切。第二十五回写到建文帝逃出鬼门，乘道人王升舟潜入神乐观时，讽刺地贬辱之云：“想是太祖僧缘未满，故令乃孙再传衣钵。”贬得可也尖刻。他在描写自然人文情景，逢有自得处，可也情不自禁地用小说批注笔法，自赏、自赞、自叹起来。例如：《明史通俗演义》第五回写朱元璋督兵追赶元兵，“方从浚阳桥通舟直入江中，天雨已霁，两岸波平，红日当空，青山欲滴”时，自评云：“绝妙：好一幅大江图。”第二回后批中更是忘乎所以地自赞、自叹云：写“郭子兴庸柔，孙德崖之贪戾，彭大之粗豪，赵均用之刁狡，皆为明祖一人反射，尤妙在用笔不直，每述一事，辄用倒戟而出之法，使阅者先迷后醒，益足矚目。看似容易却艰辛，阅仅至此，已自击节不置。”

《三国演义》的正文是罗贯中写的，后人毛宗岗等批注的。这些批语、评语既可帮助读者领会原作者的构思、意境、笔法，也可增添读者很多文艺知识，为广大群众所欢迎。因此，这种批注，发展到清末民初，成为演义小说乃至历史演义编写体裁的定式。而

且，象蔡东藩写《历代通俗演义》那样，原作者自写正文，自写批注，并对自己的笔法进行不无得意的自评，读来分外真切。因为别人评点，难免隔靴搔痒，甚至多所误解之处。自写自评时，对自己的构思、意境、笔法，自然比别人评点要真切得多。

四

辛亥革命前，资产阶级改良派中严复和夏曾佑等一翼，既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派，也认为康有为搞维新变法“操之过激”。理由是：中国“民智未开”，只有大力兴办教育事业，“民智”启发了，才能谈政治改革。蔡东藩原是这样所谓的“民智决定论”者。

邵希雍在辛亥那一年为蔡东藩的《中等新论说文范》作序说：“吾同学友蔡君东藩，究心教育有年矣。本岁春，宦游闽中，甫逾月即归，危崖勒马，智士也。夏初与晤申浦，纵谈当世事，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代，余深颺之。”辛亥革命后，蔡东藩在《民国通俗演义》第八十回中评论康有为时还说：“彼康有为亦何为者？前清戊戌之变，操之过激，几陷清德宗于死地，……名为保清，实则害清，是不可以己乎！”严复、夏曾佑的改良派思想对他的影响，直到辛亥革命后余毒尤存。

蔡东藩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。他关心国家民族的安危。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，他读了邵希雍的《高等新论说文范》稿本后，说邵文假借文字，陶铸国魂。“此所谓发爱国思想，播良善种子也。”他自己着笔撰写《中等新论说文范》时，武汉“三户闻已兴起矣。”他欢欣鼓舞写完了《文范》，满怀爱国激情，写《自序》说：“窃谓为新国民，当革奴隶性，为新国文，亦不可不革奴隶性。”他反对老师宿儒，专摹唐宋诸大家文调，每下笔，撷拾古文一二语，即“自命为韩、柳，为苏、王，而于文字之有关系，绝非所问，是谓之

优孟学也可。”更反对后生小子盲目摹学古文和报纸今文，他说：

夫我侬我见，我为我文，不必不学古人，亦不强学古人，不必不学今人，亦不必盲从今人。但能理正词纯，明白晓畅，以发探新道德、新政治、新社会之精神，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。窃不自量，本此旨以作文，不求古奥，不阿时好，期于浅显切近，供少年学生之应用而已。

辛亥十月十日，武昌革命，清帝退位，民国成立，资产阶级民主思潮高扬，促使蔡东藩的思想起了一个大飞跃，迅速朝向民主派转化。这时他满腔热情，满以为一经革命，全国人民便可御外侮、雪国耻，同享共和的幸福了。可是，清室刚推翻，民国成立不久，军阀割据，帝国主义侵略日急，国事毫无建树，他思绪起伏，悲欢交集。他在《中等新论说文范》的《国耻论》中说：

革命以后，耳目一新，若可与谋雪耻矣。乃二三雄桀！偶一得志，或且营官室，拥妻妾，但顾行乐，不顾雪耻。……嗟乎！寇深矣，可若何？而环顾吾国，仍无一誓雪国耻者。夫无一誓雪国耻之人，是终于无耻者也。我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即亡也，我亦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不即亡也。惟外族方张，鉴吾国民之不复知耻，将奴我辱我，我国民乃真万劫不复矣。

后来，他在《民国通俗演义》第四十四回写到日使迫签丧权辱国条约，袁世凯不敢拒绝，说什么“山东、奉天一带，已遍驻日兵，倘或交涉决裂，他即长驱直入，我将何以对待？”“与其战败求和，不若目前忍痛，从前甲午的已事，非一殷鉴么？”他愤怒批斥云：“试问，甲午之衅，谁实启之？今乃甘心屈辱，想是一年被蛇咬，三年怕烂稻草。”当他写到参政院长黎元洪为此签订辱国条约事发电引咎自责时，他又看到了希望，又热情洋溢地说：“总之，是民国以来第一种国耻，全体人民，须时时记着，卧薪尝胆，

发愤图存，我中华前途，或尚不至灭亡呢。”接着还下了一个批注说：“大声疾呼，愿国民热度，勿再效五分钟。”

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，接连发生孙中山下野，袁世凯洪宪称帝，张勋复辟等等一系列复辟与反复辟、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事变，民国命脉，真是不绝如缕。蔡东藩悲痛不已。他对孙中山和黄兴怀着深厚感情，字里行间，洋溢着由衷的崇敬的言词。他在《民国通俗演义》第九回末为孙中山践约辞总统职作诗赞云：“功成身退不贪乐，让位非徒践夙盟。细数年来诸巨子，如公才算是真诚。”第十回后批中，一则谓孙中山“是固革命史中之翘楚也”。再则说：孙中山“亦一仁且智也。吾重其仁，吾尤爱其智。”他赞誉黄兴为“一位再造共和的伟人”。第七十八回作诗哀叹黄兴之死云：“才经湘水赋招魂，日上扶桑倏又昏。偏是伟人多短命，人生天道两难论。”他在后批中还说：“若夫创造民国之首功，应推孙、黄两人。”

他对袁世凯的洪宪称帝事，深为不满。《民国通俗演义》第四十五回写贺振雄和李海呈文严辞指斥杨度（功过是非另论）等搞筹安会，准备为袁世凯称帝事，作后批云：

贺呈在指斥筹安会骂得淋漓酣畅，令杨度等无以自容，足为趋炎附势者戒。李呈则引证袁氏申令，阳斥筹安会，隐攻袁总统，非特杨度等闻而知愧，即老袁闻之，亦当忆念前言，不敢自悖。然而杨度等之厚颜如故，袁总统之厚颜亦如故，即达官显宦，俱置若罔闻，我不识廉耻为何事。

第七十六回叙袁世凯丧礼后，后批云：袁氏称帝，“小言之，则有背盟之咎；大言之，则有畔国之愆。……乃后起之政府，反盛称其功绩，加厚其饰终典礼，是奖欺也，是助畔也，何以为民国训乎！……呜呼袁氏！呜呼民国！”

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。蔡东藩称誉蔡锷的“倒袁”、“护国”，